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历史的吊诡：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再思考(四)（何清涟）

双击自动滚屏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世界里，“传统”仅仅只是指1949年至文革时期。在部分左派（包括还有少部分新左派）那里，“传统”还延伸到文革时期，比如一位留美学者对“鞍钢宪法”那严重背离常识的独特诠释，对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等“民主形式”的向往，就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我原来以为对“文革”的这种荒谬诠释没有什么市场，但后来海外做访问学者时，才发现我原来大错特错。我曾听到不少青年人因这一理论的发明者拥有的洋学位，因其拥有的西式话语系统而接受了他对“文革”的荒谬诠释，1997年下半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与一位在哈佛念博士学位的印度人就“文革”问题多次讨论，他的思想来源于那位留美学者，但他与我们辩论时的执拗比之于那位学者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分为二”这种剖西瓜式的“哲学”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他的最主要武器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所以“文革”也有两面性，好的一面是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贴大字报之类，你们的报纸一再报道，那时的人民是满足的，等等。我一再告诉他，那时的报纸充满了谎言与欺骗，真实的“文革”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但没有用，后来是耶鲁大学的台湾籍政治学博士赵学维先生学着他那样“一分为二”地分析纳粹德国，他才无言以对，但心里并未服输。在他们那里，那段时期的荒谬与血泪消失了，剩下的只有那些在纸面上被过度拔高的“理想主义精神”，人帮人的传统。而被抽去不少内容的这种历史描绘是不真实的，因为那是一个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时代，除了被主流（其实也是唯一的）媒体反复宣传的那些东西之外，我们有肃反扩大化，有反右，有大跃进，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贯穿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有哪一场不是血淋淋的？我曾读到一位朋友收藏的一份个人档案，这是一位解放前在一家歌舞厅里伴舞的舞男，1949年时只有20岁，当时已有两年舞龄。这种经历理所当然地被社会划为“坏分子”，交居委会监督改造。这位前舞男以后也没有正式职业，仅仅依靠给人家做各种零工糊口。此后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艰难的四处觅食，只剩下做检讨、向革命群众认罪这一内容。从1950年直到这个人生命终结的1978年，他的个人档案里除了这些毫无人格尊严可言的检讨书、交待书、认罪书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留下。对于认为“死几千万人没什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来说，这个人实在卑微得如同一粒尘埃。但在另外一种以“大数原则”为基调的文化里，他与众生一样平等，生而享有一切天赋人权——所谓“大数原则”，指的是一个人的损失对社会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他本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西方社会重视个人价值，才有这种计算方式——如果这个人到死那天为止，生活内容只剩下动物般的存在，这种思想改造的意义又在哪里？一个做了两年舞男的青年，竟然为此“罪孽”要付出毕生的尊严，其残酷性正表现了我们这种东方文化的特色。要知道，现在对“文革”的控诉，主要是“文革”前那些还生活得不错的高知、高干们的控诉，而本来就如同一粒尘埃的社会另类人物，对“文革”那套专政手法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已丧失了辨别苦难的能力。更何况，他们不少人早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尸骨无存，有的全家人被斩草除根，他们的悲惨呼号早已消失在漫漫历史长空中。比如我的家乡1968年那场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分子的屠杀，就在任何史籍中没留下记载，上万生命就这样不留一点痕迹地从历史上消失了——“史无前例”这个词确实用得很对，因为“贫民政治”只有在这时才真正在全中国当了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时期，“贫民政治”也只不过在一个区域内当了一段时间的家。

曾经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居委会主任之类“群众代表”的厉害？又有谁希望再被群氓专政？如何评说那个时代，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但如果要回去的“传统”竟是那样一个法西斯年代，只能说这些人已经患了历史失忆症。最近我国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现在的社会失范状态缺乏认同感，另一方面则说明人们被那种消解历史的后共产主义教育所深深蒙骗，因为那本

书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刻意制作出来，完全隐去了历史残酷的一面。那一面被刻意隐去的历史真实，已有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为证。

今年前几个月，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风行一时。这一剧作写得很机智，文风也俏皮活泼，作者有相当高的才情，对社会也有关怀。但整个来说，该剧如果用之于宣泄对改革所造成的问题的不满倒也不错，但在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却是极不负责任的。作者在两个问题上避实就虚，一是在两种制度的对比上，作者拿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与图解中的资本主义相对比，如在谈到社会主义理想时他只谈切×格瓦拉的人格魅力，而不谈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后果；二是他试图在切×格瓦拉个人人格魅力与他所从事的事业之间建立一种事实上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处处给人以暗示，切的个人魅力赋予了他所从事的事业以不可质疑的神圣性。其实个人人格与其所从事的事情本身并无一定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说，仅以人格而言，在那个阵营中，也只有一个切×格瓦拉，而流氓却要多上千倍万倍。总之，作者搭了一座桥，但只片面展示了桥两端的東西，桥本身却是一条虚线，而问题就出在虚线上。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是要回到更早的传统，这种声音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建设进行了批判。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当然绝对必要，但是从实践层面来说，我们还能在“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回家”的路吗？

历史是一维性的，它只有一个延伸方向，不可能再回头。然而了解历史，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出发点。

对于历史，现在的年青人从整体上来看确实缺乏兴趣。因为我们的历史充满了太多的谎言，成了概念的堆积与教条的集成。对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的功绩描述，都不忘记加上一笔：“某某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其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一部充满了不实不敬的否定之辞的历史教科书，我们还想靠它培养出后代的爱国主义精神？结果当然是青少年们对历史产生深深厌倦，他们的父母一代不少也属于文化教育严重不足的一群，只要与高考无关，不少人都认为不必要浪费时间学习历史。我写过唯一的一篇回忆录“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发表于《黄河》杂志，陕西《各界》杂志也曾分两次发表。与我同时代的读者对那种生活感同身受，记忆犹新。但居然还有一两个陕西的年轻文人跑到《各界》编辑部轻薄地说：“老谈那些干什么！要向前看吗”。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式，已经让不少青年人觉得文化大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历史最大的侮辱，就是对它横加阉割。用这种阉割过的历史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是对祖国的未来极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然而历史对人类的重要性，不会因为这种对历史的粗暴阉割而就此消失，轻视它的人必将受到它的严惩。历史除了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种作用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自尊自爱之情，让我们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走过些什么路，以便今后走得好一些。经济学应该说是一门与历史相距比较遥远的学科，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用发展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碰壁以后，终于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一点：了解发展中国家历史对分析今天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有关键作用。这才有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经济学家中唯一能够在思想体系的庞大方面与马克思媲美的约瑟夫×熊彼特就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但如果三门只能学习一门的话，他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从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熊彼特对历史的尊重：

“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多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约瑟夫×约瑟夫×

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还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我记不清名字了）说过：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以前的伟大，不学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弱。


不少青年人常问我：何老师，你为什么不开出一个给中国治病的药方？我回答说，我的看法其实都已尽语言环境允许的最大限度写出来了。我从未隐瞒自己反对什么，赞成什么。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培养人们的公民责任意识。这责任意识的核心点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真正地将中国当作是自己的国家，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与民族的前途有关。不要纵容自己往社会上倾倒垃圾，却指望有“救世主”来打扫清场。只有从我做起，不期望有救世主出现，中国才有希望。“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我们却在热情讴歌“大救星”。什么是文化差别？这就是文化差别。

人类历史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尊严，发挥创造力。至于每一时代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则需要仰赖那一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责任感，以及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责任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则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写完这篇没有答案的思索时，正值深夜，我伫立窗前，深夜的深圳已安静下来，极目望去，只有那无尽的苍茫夜色。渺渺茫茫中，习惯了孤独的我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红楼梦》里一句诗突然跳了出来：

“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在上帝眼中，人类到底有多少尊严？



版权所有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